

新儒家、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 能否會通？

關於中國混雜現代化的弔詭格局

何乏筆 Fabian Heubel

會通儒家傳統、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似乎已成了中共的官方立場。然依據一般西方對現代化或現代性的理解，這種會通是不可能的，因為包含太多違背邏輯而應要化解的矛盾和衝突。不過，假設如何會通三者是目前中國現代化道路所面臨的難題，那麼，如何思考這三者能「通」還是不能「通」，便成了面對「中國崛起」的重要問題——在大陸是如此，在台灣是如此，在海外也是如此。進行此番思考的難度極高，因為自從1895年甲午戰爭結束以來，中國現代化的道路極其曲折混雜。對當代哲學而言，如何創造一話語模式，以透徹地思索中國混雜現代化所形成的弔詭格局（*paradoxe Konstellation*），無疑是巨大的挑戰；而且可確定的是，當面臨此挑戰時，不得不採取跨文化、跨時代的視野，以通古今中西之變。在此背景下，三統論是值得注意的話語模式。無論是牟宗三之三統論（道統、學統〔科學〕、政統〔民主〕）或甘陽的新通三統，或姚中秋所謂「儒家憲政民生主義」，都是著眼於思考中國大規模地混雜古今中西資源所造成的現代化道路如何能「通」的問題。

從港台當代新儒家的角度來看，問題顯然不在於如何會通儒家

傳統、毛澤東傳統（社會主義）和鄧小平傳統（經濟自由化），更在於如何會通新儒家、自由民主與社會主義——在廣義的新儒家中，流亡港台的學者特別關注儒家與自由主義的溝通，居於大陸的學者則特別關注儒家與社會主義的溝通。由此觀之，假如新儒家要積極地、且具批判性地回應新通三統的話語模式，那麼「港台新儒家」與「大陸新儒家」能否超脫冷戰意識形態的遺留，以進行深入溝通，就是一個值得關切的主題。進言之：台灣學界主要的批判對象究竟應是接近官方立場的新通三統，還是被官方話語所批評的激進復古派所主張的反對西方民主制度、追求王道政治、「完成現代中國的復古更化」（參見〈蔣慶回應李明輝批評：政治儒學並非烏托邦〉）？儘管通三統論與王道論之間存在著連結的可能，然原則上分別代表兩種回應中國混雜現代化的話語模式。兩者都值得深入探討，但同時，就思考策略而言，選擇其中之一作為批判的焦點是必要的。筆者認為，從兩岸當今的政治情境所面臨的迫切問題來看，答案顯而易見：批判的焦點應該是新通三統論；而對新王道論的「烏托邦」進行反駁則是次要。在此基礎上，筆者將從儒學與社會主義的關係問題切入關於儒學與政治現代化的討論，以進一步反思新儒家、自由民主與社會主義能「通」還是不能「通」的問題。

難以否認，若站在「當代新儒家」（或港台新儒家）自從1949年以來所發展的政治哲學角度（此處「當代新儒家」主要是指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所打開的思想格局，不包含熊十力、梁漱溟等人），以上的問題幾乎是無法思考的。在1949年之後的意識形態鬥爭中，在充滿使命感的反共意識（包含反唯物論和辯證法）下，新儒家學者對儒家傳統的批判性重構獲得重要突破，但同時在歷史局勢和時代氛圍下，他們所選擇的發展道路也不可避免地局限了新儒家的視野和潛能。因為當代新儒家選擇了藉由「自由民主」

來探討儒家與政治現代化的關係，至於儒家與社會主義的關係，大體上被排擠到當代新儒家思潮的邊緣地帶。基於此，李明輝在澎湃新聞的訪談中便強調，儒學與自由民主沒有任何基本矛盾。無疑，在反對君主制度而提倡民主共和的信念下，新儒家與自由主義的理論會通，成了港台新儒家思考中國政治現代化的重要貢獻。然而，當面對中共的一黨專制與台灣自由民主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港台新儒家與文革以來的大陸新儒家之間的學術論辯時，將可發現：要擺脫冷戰思想結構的陰影仍然很難。問題是，究竟何種思想格局能真正超出那滲透到兩岸三地儒學話語裡的冷戰思維，並能促進兩岸三地在政治現代化方面的「溝一通」？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溝通的視角和條件，乃來自於當代漢語哲學所累積的跨文化潛力、及中國混雜現代化所蘊釀的規範性內涵。

一旦試圖從新儒家的角度探索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的弔詭格局時，當代新儒家論自由民主的話語模式便顯得不足。問題在於，當代新儒學在政治現代化方面，大致接受了西方現有的自由民主和憲政制度，因此在政治方面難以對新自由主義籠罩下的民主危機提出反思，也不易設想儒學遺產如何有助於構思一種（不限於西方民主經驗的）未來民主，並能關注全球自由貿易的擴充與民主機制之間的嚴重衝突。此問題之所以重要，因為在面臨各種理論話語的挑戰之際，可能對中共政治機制（或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造成最大威脅的，並不是「原教旨主義儒家」的王道政治或西式的自由民主，而是「西化」的新儒家（儒家與自由主義結合）。在邏輯上，此情形不難理解，因為如同西化的新儒家一般，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也是混雜化過程的產物，體現了中國混雜現代化的深層動力。由此可揣想：因為與混雜現代化道路的大趨勢背道而馳，中式王道政治只能藉由徹底的反現代化來構思，而西式自由民主則只能

採取全盤西化的激進話語來構思，因此實現的可能不大。對比之下，當代新儒家的優點和「迷惑性」，恰好在於「西化儒家」的混雜性和跨文化性。然而，其弱點在於不熟悉馬克思主義，不熟悉歐洲批判哲學從康德發展到馬克思的曲折和連貫，因而不熟悉社會主義，並且難以發揮儒家與社會主義的親和力所蘊含的思想潛能。

換言之：在1989年以來形成的後革命和後意識形態情境之下，大陸思想界出現了许多試圖深思中國混雜現代化道路的話語模式。然是否已醞釀出充分的條件，來「彌合革命遺產與文化復興之間的矛盾」，來自覺地走上「文質相復之道」（參閱柯小刚，《道學導論（外篇）》，第五章）？儘管西方現代性（及其所包含的神話）已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組成部分，但根據筆者的觀察，漢語學界迄今仍不擅於探討中國混雜現代化所造成的弔詭格局。從當代新儒家所累積的跨文化潛力來看，自文化民族主義的立場對西方現代性和西方價值進行反駁，這並不是一種進步，也不意味著開發中華文化的普遍性，以及對世界文化的貢獻，反而代表著一種朝向自我封閉的退步。自我設限於倡導「中國特色」，難道不正是對西方現代性及其歷史挑戰的投降？換言之，批評文化民族主義的病態，並非意味著去否定對重構中國古典文教或提升中國人文經典教育的種種努力，相反地，在反省中國混雜現代化所造成的弔詭格局時，中國古典文教所蘊含的智慧正是關鍵要素。在這方面，筆者能同意甘陽的觀點。他認為，促使中國的「文明自覺」不能「以『獨尊中學』而排除西學的方式來做」，而「需要走『中西並舉』的道路」。因此，針對「獨尊中學」的傾向，他指出：「目前國內一些自稱新儒家的朋友頗有這種主張，但這即不現實，也不可欲。」（甘陽，《通三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頁141）

假如自1949年以來，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乃建立在西方現代性的

革命神話之上，那麼文革結束後（尤其是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的發展，的確讓此一神話徹底破滅。然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神話破滅之後，政治現代化的前景為何？在許多著名的歐美漢學家看來，傳統的君主制度與20世紀的一黨專制之間，存在著深層的連續性。這種看似現實主義的理解，其實明顯漠視中國自甲午戰爭以來的一系列革命性斷裂，忽略了所謂西方現代性早已滲透到中國文化歷史的血肉之中，構成混雜現代化的歷史事實。在擁護民族文化的濃烈使命之下，當代新儒家對混雜現代化的哲學反思，已明顯超出了中國—西方的二元架構；在思想的深處，推動了當代漢語哲學的現代化，突破了西方漢學家及許多20世紀中國學者對儒家的刻板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此突破是藉由「心性之學」的標誌而完成的。

就當代新儒家而言，對抗中共一黨專制的關鍵任務，在於重構儒學的主體性話語，再藉由自律主體（內聖）「開出」科學與民主的新外王，「曲通」道統、學統和政統。就筆者的淺見，當代新儒家心性論的最重要貢獻，在於主體概念的重構與自我坎陷說的現代自覺。然而，藉由重構宋明儒學之「道德主體」來建構新外王的努力，在今天顯然面臨嚴峻的理論挑戰。在台灣，許多親近當代新儒學的人士早已注意到：心性主體的唯心論陷阱，與新儒家在思考政治現代化的困難息息相關。心性之學的重構，是不容忽視的貢獻，但若若要面對當前的歷史挑戰，不得不思索應如何突破心性主體的形上學基礎所面臨的鬆動，俾以促進新主體範式的產生。在中共意識形態破滅之後，這乃是新儒家走出專制陰影的關鍵要素之一。然當代新儒家在內聖（心性主體）開出新外王的思想格局之下，是否有理論能力來回應新儒家、自由民主與社會主義究竟能「通」還是不能「通」的問題？假設中國大陸走出一黨統制的道路必定與中華民國在台灣走出一黨統制的道路有所不同，因而大陸在政治方面的發

展很難效法台灣的民主化模式而推進，那麼，社會主義便是不可迴避的難題。

近幾年來，李明輝一再反駁對康德道德哲學及自律主體的窄化理解，提出康德哲學基本上能容納社群主義和德行倫理學的洞見。在他看來，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互補（而非相斥），在康德的倫理思想中，可找到相應的理論依據，隨之能超出從自由主義或從社群主義片面地解釋儒家的弊病。不可否認，在面臨儒家與社會主義的深層關係時，將社群主義容納到儒家與康德哲學交錯的理論格局之中，確是具有發展潛力的嘗試。不過，當代新儒家在肯定自律主體的基礎上，能接納自由民主，能接納社群主義，但殊難思考社會主義與唯物論的關聯性。

在這方面，儒家氣學（尤其是張載和王夫之）可能扮演著重要的橋樑角色。這並非意味著，儒家氣學「具有神奇的功效，能包治百病」（參見李明輝回應稿），但藉由溝通心物之間的氣化論，來思考「神（心）—氣—物（形）」的主體概念，或能有助於革新心性論的主體範式，也有助於新儒家會通社會主義的唯物論向度。或說，根據筆者目前的假設，若片面地以「心性之學」為新儒家的理論核心，則不能「通」新儒家、自由民主與社會主義，不能回應中國混雜現代化的弔詭格局，也難以提出通三者的另類話語模式。然而，如同李明輝所指出，相關的「爭論頗大」，而本文不適合投入此爭論（可參考賴錫三〈「港台新儒家」與「大陸新儒家」的「兩行」反思〉對心性論所提出的意見）。持平而論，關於儒家與政治現代化的討論，使台灣儒學研究中兩種思想道路（心性論的道路與氣化論的道路）之間的潛在爭論，或可稱之為「二王（王陽明與王夫之）之爭」，浮上檯面。對新儒家思考政治的現代化而言，這不啻是具有正面意義的轉捩時刻。

後記

在〈《澎湃新聞》訪問之回應〉中，李明輝批評本文，指出：「何乏筆在發言中強調：若站在當代新儒家（或港台新儒家）自從1949年以來所發展的政治哲學角度，儒家與社會主義的問題『幾乎是無法思考的』。他背後預設的推理如下：由於港台新儒家的政治哲學從康德哲學出發，故必然反對共產主義與唯物論，因此無法理解社會主義並反對社會主義。這番推理不但是昧於事實，而且論證也有很大的破綻。」筆者閱讀相關說明之後感到高興，因為其中的確可見一種思考當代新儒家與社會主義的可能研究視野，也樂意承認「港台新儒家對於儒學與社會主義的關係可以提供很豐富的思想資源」。筆者期待這些資源將來被積極開發，然而針對此研究視野要初步提出兩點感想。第一點是針對「會通儒家與社會主義」在台灣學界所面臨的歷史條件和困境；第二點是針對康德與社會主義、康德與馬克思的關係。

李明輝提及值得開發的研究視野，但難以否認的是，這樣的視野在台灣的儒學研究中並未受重視，遑論開發。過去沒有被重視，而當今開始被重視的情境背後，其實具有複雜的歷史條件。筆者「背後」的預設，首先與康德哲學只有間接的關係，僅是由歷史的可能性條件來思考問題。楊儒賓表述相關問題的方式，筆者是可以同意的：「中華民國的學術如果以1949對分的話，前期的民國學術和後期的民國學術之銜接自然不可能一路順暢，沒有令人遺憾的因素。最明顯地，莫過於社會主義在1949年後的台灣基本上處於失聲的狀況。此一失聲連結上一個歷史階段的日本殖民統治對左派思潮的殘暴鎮壓，社會主義的思潮在戰後台灣的發展遂不能不隱微委屈，柔

腸寸斷，沒有傳承可言。社會主義與同時期的兩大思潮之間的整合顯然也未曾展開，遠不如新儒家與自由主義的整合。儒家與社會主義的精神本來是相當緊密的，從康有為、梁啟超到熊十力、梁漱溟，我們都可在他們的思想中找到極濃烈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因素。一落到現實的處境，兩者竟然無法發生更有意義的結合，主要原因當是政治殘暴地介入所致。左派思潮在當代台灣社會的缺席，無疑地是島嶼人民的一大損失；左派在大陸無法產生人文化成的精神能量，則使得全體中國人在上世紀50年代以後遭受難以言說的苦難。」（楊儒賓，〈在民國思考「民國學術」〉，收入《1949禮讚》，台北：聯經，2015，頁172-173）。換言之，儒家與社會主義的關係之所以長期被台灣新儒家所忽視，首先並不是個別學者的缺失，而是與客觀的歷史情境和話語界限（即所謂歷史的可能性條件）息息相關——請注意：「歷史的可能性條件」已蘊含著康德哲學與馬克思哲學的交錯；這樣的交錯，恐怕對心性論傾向於道德化、內心化、精神化、個體化的思想模式而言，並不容易理解。由此可回到當代新儒家「幾乎無法思考的問題」，因為在筆者看來，幾乎無法思考的不僅是儒家與社會主義的關係，更是會通新儒家、自由民主與社會主義的相關問題，以及三者的弔詭格局。此處所謂的社會主義，不可能只是理想化的「民主社會主義」或「倫理社會主義」，而意味著要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挑戰，理解其歷史和思想條件——也需要理解為何許多新儒家學者（無論是港台、大陸或海外的）在相當高的程度上願意順應中共「治理現代化的要求」，甚至與當前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妥協。由此可回到本文前述的建議，即在面臨大陸的儒家復興時，應把批判的焦點放在接近官方立場的新通三統論，以及相關的討論和批評上。根據筆者的理解，李明輝所描繪的「民主社會主義」是一種會通自由民主（包含市場經濟）與社會主

義的模式。問題是，藉此能否對試圖會通儒家傳統、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的話語模式，提出有力的分析和批判？若台灣學者可積極參與這樣的討論，對新儒家政治哲學的發展而言，將有別開生面的意義。

李明輝將筆者的觀點簡化為：由於港台新儒家的政治哲學從康德出發，「故必然反對共產主義與唯物論，因此無法理解社會主義並反對社會主義」。筆者沒有預設這樣的「必然」（但確實經常對當代新儒家運用康德哲學的方式感到不安，尤其懷疑：康德的批判精神在新儒家脈絡下是否已被教條化，或說「去批判化」）。相反的，在筆者自己的重要思想背景裡，即在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中，康德與馬克思的「溝一通」伴隨著批判理論的演變（可參閱 *Oskar Negt, Kant und Marx. Ein Epochengespräch*）。當然，兩者之間，「左翼黑格爾主義」乃是不可缺少的思想橋樑。根據霍耐特（Axel Honneth）的說法，左翼黑格爾主義的核心主題在於，「批判的視角以某種方式被理解為錨固於現存社會之中」。意即，在康德、黑格爾、馬克思三者的弔詭格局之中，康德哲學的歷史化和唯物論化是強大的、影響深遠的思想線索，也對當今法蘭克福學派發揮了各式各樣的作用，無論是哈伯瑪斯的話語倫理學或者霍耐特的承認理論和社會自由的概念皆然。由此觀之，康德確實「可以與社會主義相結合」，但同時社會主義不可以「與唯物論脫鉤」。無論如何，李明輝也承認「康德哲學與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關聯始終為本地學者所忽略」，那麼本次的爭論便開闢了值得共同著墨的問題場域。

何乏筆 Fabian Heubel，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法蘭克福歌德大學社會研究所兼任成員。研究領域：跨文化研究、當代漢語哲學、批判理論、西方漢學、藝術哲學。